

科学哲学的研究和教学：访谈阿钦斯坦教授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eter Achinste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梁贤华 /LIANG Xianhua¹ 彼得·阿钦斯坦 /Peter Achinstein²

(1.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1; 2. 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 美国马里兰, 21218)
(1.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1218, Maryland, USA)

摘要: 本篇学术采访既是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奖获得者彼得·阿钦斯坦的一个学术自传, 也是他的关于科学哲学的研究和教学的经验总结, 而且还是对科学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论阐述。总的来说, 阿钦斯坦教授非常重视原著教学, 注重问题意识, 并且强调培养哲学论证的能力。

关键词: 彼得·阿钦斯坦 科学哲学 证据 归纳 弦论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autobiography of Peter Achinstein, a famous philosopher of science and winner of the Lakatos Prize, but also a summary of his experience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o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me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general, Professor Achinstei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eaching of original works, pays attention to problem awareness, and emphasizes the cultivation of philosophical argumentation ability.

Key Words: Peter Achinste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Evidence; Induction; String theory

中图分类号: N031; G222.1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04.015 CSTR: 32281.14.jdn.2026.04.015

引言

阿钦斯坦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哲学系教授, 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归纳逻辑学家和现代分析哲学家。他同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希伯来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师从蒯因、亨普尔、赖尔等世界一流哲学名师。他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其重要代表作包括《粒子说和波动说》(1991, 获拉卡托斯奖)、《证据专著》(2001)、《证据、说明和实在论》(2010)、《科

学猜想》(2018)。牛津大学出版社在2013年专门出版了一本纪念他的论文集《科学哲学很重要: 彼得·阿钦斯坦的哲学》, 供稿者包括范弗拉森、劳丹、诺顿。这是继卡尔纳普之后在世哲学家获得的一个巨大荣誉。阿钦斯坦在2023年被评为“Krieger-Eisenhower教授”, 这是一个杰出成就奖。

这个访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阿钦斯坦教授在哈佛大学的学习经历、科学哲学的研究、科学哲学的教学。

一、哈佛大学的求学经历

梁: 请您谈谈, 为什么选择科学哲学作为

收稿日期: 2021年1月26日; 返修日期: 2025年7月2日

作者简介: 梁贤华 (1984-) 男, 广西藤县人,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和归纳逻辑。Email: hallolxh@163.com

彼得·阿钦斯坦 (1935-) 男, 美国纽约人, 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 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归纳逻辑和分析哲学。Email: peter.achinstein@jhu.edu

毕生的事业？据说这是因为您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受到亨普尔鼓舞的缘故。对吗？

阿钦斯坦：我并没有从一开始就选择把它作为毕生的事业，但哲学对我来说总是引人入胜的，因为它提出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根本问题。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概率论，特别是卡尔纳普的概率理论，而这让我对科学哲学产生兴趣。

作为一个学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亨普尔。在我读本科的时候，他来哈佛大学访问一年。他讲授了两门课程，一门讲概率，另外一门讲科学哲学。它们是我在哈佛大学上过的最有趣的哲学课程。在我读博士时，我在概率和归纳领域中写我的博士论文。这把我导向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证据，能否用概率来定义证据？与此同时，我开始在哈佛大学学习物理课程，并且工作后继续在霍普金斯大学学习，这让我对科学哲学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所以，我并不是通过周密的计划来开始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在我读博士时，我并不像其他的一些博士生那样在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自己想要研究的主题是什么。你知道自己的能力，并且你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当时的哈佛大学，几乎没有任何老师监督你。作为一名博士生，你没有导师。你得自力更生。许多学生没法在这种条件下学习，所以他们退学了。这种学习方式是艰苦的、竞争激烈的，并且没有人告诉你自己表现得好不好。你真的必须要有动力才能坚持下去。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现在你有许多监督，人们都在鼓励你。在我读博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获得成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很擅长这一点，我不需要导师。就你的博士论文而言，只有在最终你把它提交给哲学系后，你才能得到唯一的反馈。而且当你提交论文后，你根本不知道谁将会评阅它。事实上，当时我问哲学系主任，是否可以任命蒯因为我的论文答辩委员。蒯因是哲学系里最著名的哲学家。但是系主任说，“我不能强求蒯因。”

梁：所以，您没有指导老师？

阿钦斯坦：不，本科生有一个指导老师，你可以挑选。在那个时代，哈佛大学对本科生

的重视要比研究生多得多。如果你追求荣誉，那么你得写一篇论文。因此，我有一位论文指导老师，费思，他的研究方向是认识论。我的本科论文研究蒯因和刘易斯之间的一个争论。在蒯因之前，刘易斯在哈佛大学非常出名。刘易斯捍卫分析-综合的区分，而蒯因则批判它。在我的论文中，我支持刘易斯，反对蒯因。蒯因是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他问了我30个艰深的问题，并且对每个答案都打了分数。

梁：所以，您在本科时有一个指导老师，但在博士期间则没有指导老师？

阿钦斯坦：是的。

梁：您怎么知道自己是否在正确的道路上？

阿钦斯坦：你并不知道。就像现在你向一份杂志投稿一样，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否会被录用，或者他们是否认可你的论文，或者他们将会要求返修。从这个角度来看，博士期间的学习更加艰难。

梁：您多次提到蒯因，是否意味着他对您的影响最为深远？

阿钦斯坦：我上过蒯因在哈佛大学开的所有课程。他是哲学领域中的一个大人物，是一个巨星。我在本科期间学习了他讲授的大部分课程，而我在博士期间学习了其余的课程。并且在博士期间，他专门给我讲授了一门高阶数理逻辑课程。

梁：请您谈谈除了蒯因之外的其他对您有重要影响的老师。

阿钦斯坦：嗯，正如我刚刚所说的，亨普尔对我有重大的影响，虽然在我读本科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客座教授。蒯因并不擅长教学。他才思敏捷，富有新意，但是，他主要是通过他的著作而不是教学产生影响。而亨普尔在著作和教学这两个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他是到目前为止我在哲学领域中所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他的思维非常清晰，富有活力。他也和蔼可亲。他对待教学非常认真。

梁：您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卡尔纳普的概率理论。您是怎么获得这个想法的呢？

阿钦斯坦：在我本科期间学习的亨普尔讲授的概率课中，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讲卡尔纳

普。他认识卡尔纳普——最伟大的在世哲学家之一。卡尔纳普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概率的逻辑基础》，于1950年发表。像蒯因一样，卡尔纳普有伟大的思想，并且他能够非常仔细地把它们表达出来，在研究概率论背后的逻辑问题方面，他在技术上很有天赋。他不仅仅是证明定理，他还想寻找合乎逻辑的概率基础。所以卡尔纳普发展了一种现在不太流行的理论，但它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它被称之为逻辑概率。

卡尔纳普想要像形式逻辑那样来研究概率。他想发展一种系统，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可以通过纯粹的形式演算判定一个科学理论为真的概率是多少。这个系统将会能够帮助解决科学争论。例如，当今物理学中的一个最具争议的理论是弦论，它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在10-维时空中振动的弦构成的^①。一些物理学家认为，鉴于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这个理论为真的概率实质上是零，其他的物理学家则不同意。卡尔纳普想提出一种精确的、形式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争论。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令人激动的计划。亨普尔在他的概率课上讲了卡尔纳普的系统。这让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这些东西是如何起作用的。

所以，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证明了一些关于卡尔纳普系统的定理，指出它在特定的方面是无效的。例如，假设你有一个抛掷硬币的结果序列，并且大约有50%的结果是正面向上。但是，再假设每一个整十次（第10次，第20次……）的结果都是正面向上。现在卡尔纳普能够发展一个只能考虑正面向上的相对频率的系统，而不是正面向上出现的次序。所以，对他来说，在第100次抛掷中获得正面向上的概率将会是1/2，因为这是在该节点上观察到的相对频率。但是，看，你说每一个整十次的抛掷结果都是正面向上，所以在第100次抛掷时结果出现正面向上的概率应当远远大于1/2。我形式地证明卡尔纳普的系统不能考虑证据中的周期性问题的。我把自己的论文投稿到一个叫做《科

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杂志。他们把它寄给卡尔纳普，后者写了一个回应。当然，这让我很感兴趣。因此，这儿是我的论文，而接着是卡尔纳普的回应。在它们正式发表之前，卡尔纳普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我有另外一个定理证明我能够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我说，“卡尔纳普教授，非常感谢您，这是莫大的荣幸，能否把证明给我？”他说，“我不能给你该证明，因为我弄丢了，而且我无法重构它。”所以，当他发表他的论文时（在我的论文后面），他加了一个脚注，“这个证明太过复杂，无法在这里给出。”因此，这是一个未证明的定理。我甚至花了一两天时间才弄明白他的定理的意思。但是，我决定不再以出版物或私下的方式回应卡尔纳普。我们向世界展示竞争性定理的事实，已经足够。

梁：您还有其他相似的令人激动的经历吗？

阿钦斯坦：我在读博士期间，哈佛大学给我一个奖学金，让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学习一年。当时海外最令人向往的地方是牛津大学。那时牛津哲学系拥有超过七十名教职工。我去访问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教授，赖尔。他写了一本书叫《心的分析》。而且他喜欢接见外国学生。当时许多英国教授对外国人并不是特别友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赖尔喜欢接见新面孔。赖尔说，“你说你正在研究归纳。你知道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归纳的文章吗？”我说，“没有，请您谈谈它。”然后他告诉我有关的内容，并且给了一份他刚发表不久的文章。所以我抓住机会写了一个回应。我在英国杂志《分析》(*Analysis*)发表了一篇批判赖尔的文章，而赖尔在同一期杂志上进行了回应。有像卡尔纳普和赖尔这样的大人物回应你的作品，真的会让你倍受鼓舞。

二、科学哲学的研究

^①详见 Peter Achinstein. *Speculation: Within and About Scienc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梁：一些学者认为，归纳是科学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阿钦斯坦：当然同意，它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许多学者把它看作是科学的基石。在十八世纪，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休谟提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论断：归纳是没有被证成的。但是，你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在十七世纪，休谟的偶像，牛顿说，“当然，归纳是证成的，我们一直都在使用归纳，事实上没有归纳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得出我的重力定律。”在他所提出的四条用来证明他的重力定律的科学推理规则中，牛顿把归纳列为第三条推理规则。它的思想是：如果所有已经观察到的物体都满足一个已知的定律，那么你可以推断，所有的可观察的物体将也满足它。从这里你可以普遍化，说，宇宙中所有的物体也满足它，无论它们是否可观察到。但休谟说，“当然，你可以普遍化，但是它是没有被证成的。你既不能演绎地辩护归纳，也不能归纳地辩护它，因为这样做的话将会导致循环论证。所以，归纳推理是不合理的，即使这是人类，包括科学家，总是在使用的一种推理模式。这只是心灵的一个习惯，是没有得到证成的，但是我们却被它困住了。”自休谟以来，哲学家们一直都在尝试解决休谟难题：一个像牛顿的规则3那样的归纳规则，如何能够得到证成？像在哲学中常见的那样，人们提出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包括两个极端的方案。一个极端方案是波普尔提出的，认为优秀的科学家并不使用归纳，而只使用演绎。另一个极端是当代哲学家诺顿提出的方案——我认为正确的方案——是：对证成来说，不存在普遍有效的归纳规则。每一个归纳推理，每一个普遍化，都是通过特殊的经验事实（在每一种情况中都不同）被证成的，依赖于该普遍化。特殊的归纳是被局部地证成的，而不是通过诉诸于某些诸如牛顿的规则3那样的整体的归纳规则。

梁：您在科学证据领域非常有名。请您谈谈，为什么专注于证据理论？

阿钦斯坦：在科学中的一切，背后都有证据。问题是，它究竟是什么？如何界定它？一

些物理学家说弦论不是科学，因为根本就没有支持弦论的证据。他们想要的是什么证据？在1978年，我写了第一篇论证据的文章，发表在英国杂志《心灵》(Mind)上。在那篇文章中，我批判一个标准的证据理论——把证据定义为，对一个假说来说，任何能够提高该假说为真的概率的东西。在那篇文章中，我发展了一种新的证据定义，并且在2001出版的《证据专著》一书将其进一步拓展。对于我的思想，有许多回应，特别是那些想要为标准的证据定义辩护的人的回应。我回复了其中的一部分，因此继续探讨这个引人入胜的主题——一个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主题：当科学家寻找证据时，他们应当寻找什么？

几年前，在德国慕尼黑有一个关于弦论的学术会议，物理学家和一些科学哲学家被邀请了，包括我。物理学家们感到忧虑，因为没有实验证据支持他们的理论。这个会议的组织者达维德(Richard Dawid)说，“是的，我们确实有证据，但它是间接证据，而不是实验证据。”所以，我说，“好的，什么是间接证据？”他开始向我解释他的间接证据理论，它包括像这样的事实“这是到目前为止发展起来的唯一用来解释这种正在讨论的现象的理论（它是‘唯一的理论’，the only game in the town），这是一种在其他的领域有效的理论，这是一种简单的理论。”我拒斥这些思想，因为它们都没有提供一个充分的理由去相信所讨论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是弦论——是真的。只有实验证据能够提供好理由。

梁：但是，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证据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它并不清晰。

阿钦斯坦：在这里，其中的一个难题是，许多思考证据的意义的人想把大多数的东西囊括在该概念之下。例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简单性：如果一个理论是简单的，那么应当把它看作是该理论为真的某种证据。在2018年出版的新书《科学猜想》中，我用了两章内容来探讨简单性。一个理论是简单的这个事实，是否构成了该理论为真的证据？这个事实是否增加了我们对该理论的信念？牛顿说是的，爱因斯坦

也同意。所以,我追问他们。我说:请给出论证。牛顿没有给出论证,而只是说,“自然是简单的。”这是你能够使用归纳的原因。通过使用望远镜观察,你能够证实重力定律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有效。而根据归纳,你说,因为它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有效,所以它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有效。为什么?因为自然是简单的。一个同样的定律在任何地方都成立的世界,比一个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定律成立的世界,更加简单。对此我说:你怎么知道世界事实上是这样简单的呢?在他的公开出版的著作中,牛顿并没有这么说。但是在未公开发表的信件中,他声称上帝以简单的方式工作。他没有说他是如何证成这个论断的。爱因斯坦没有诉诸于上帝。对他来说,简单的理论在过去有效,所以它们可能在将来也是有效的。对此我的回应是:一些简单的理论是有效的,而另外一些则是无效的。简单性并不是科学真理的标志,所以它不是理论的证据。而且,你不能通过说自然是简单的来证成归纳,然后接着通过说因为在过去简单的理论比复杂的理论更有效,来证成自然是简单的论断。这种推理是循环论证。它使用归纳来证成归纳。

梁:您是“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主任。您为什么要建立这个研究中心呢?

阿钦斯坦:该中心大约是创建于1969年。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史系有一些教师对科学哲学感兴趣,而在哲学系则有一些教师对科学史感兴趣。促进这种共同的兴趣的一个重要激励是,1960年代早期出版了一本叫做《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书。作者是库恩,一个科班出身的物理学家。这本书对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因为它提供一个新的方法来审视这两个领域,并且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领域。如果你想理解科学背后的概念思想,以及它们是如何随着时间发展演变的,那么你真的需要同时研究这两个领域。

库恩引入了“范式”(paradigm)思想,它是基本概念、假设、和方法(用来理解物理世界)的集合,同时也是待解决的难题和如何推

进解决方案的指南的集合。“常规科学”,正如他所谓的,通过参考范式及其设定的难题继续进行了一段时间。然而,极其罕有地,存在“范式转移”,作为革命性的看世界的新方式的一个结果。这引出新的全然不同的概念、假设、和待解决的难题的集合。这本书影响极其深远,即使像许多其他类似的书籍一样,它是有争议的。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它被广泛地阅读,但是受影响最大的是哲学家。无论他们喜欢还是讨厌库恩,他们都在阅读库恩的作品并且做出某种反应。不管他成就了什么,他强调的同时研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重要性。一些同时研究这两方面的学术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喜欢这种思想并寻思,“为什么我们不在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一个研究中心?”所以,我去找科学史系主任,他喜欢这个想法。我们又去找哲学系主任,说让我们筹款建立研究中心吧。主任说,“好的,我们去巴尔的摩的一个跨国公司募款吧,”该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都是霍普金斯大学校友。我们以为他们会给我们资助,但他们什么也没给。所以,我们回来找主任,主任说,“没关系,我告诉你们吧,我会给你们一些钱。”他给我们的钱,只够一年邀请四个外校的学者做讲座并且每隔几年组织一次学术会议。会议论文被出版成书,供稿者既有科学史家又有科学哲学家。其中一卷的主题是“开尔文以来的物理学”。(开尔文(Lord Kelvin)是十九世纪的一个著名的英国科学家,1880年代在霍普金斯大学开讲了关于光的波动理论的系列讲座。)另外一卷是关于科学证据的,这是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课题。

三、科学哲学的教学

梁:能否请您提供一些论文选题的宝贵建议?因为您具有长达50年的丰富教学经验,我想您一定很擅长指导学生研究课题。

阿钦斯坦:我最好的学生都是自己选择研究主题的,然后我建议他们可能采取的各种研究方向。你必须对研究主题感兴趣,并且你必须具备足够的知识。并不是所有的学生同时都

具备这两个条件。一些学生对一个主题感兴趣但并不具备足够的的能力，其他的一些学生则具备相应的能力但对研究主题并不感兴趣。你必须同时具备两者。你必须要有动力和天赋。许多学生选题太大，难以完成任务。你得缩小范围，你必须提出具体的问题。但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直到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寻思它将会走向何方。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在开题时，许多学生表现得并不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好，他们会感到很沮丧。他们还没有阅读研究主题的所有相关材料，或者他们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研究主题将会把他们带向何方。

梁：听说您的学生斯奈德（Laura Snyder）是研究惠威尔（William Whewell）最出色的学者之一，可以请您谈谈斯奈德吗？

阿钦斯坦：她是转专业的一个成功范例。她原来并没有科学哲学的背景，因为她本来是想来霍普金斯大学研究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但是在她入学之前，研究该领域的那个教授去世了。所以她专注于哲学并且选修了一些我开的科学哲学课程。在课堂上我会讲密尔和惠威尔之间的关于科学推理的性质的争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论。这启发了她，并且她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正是关于这个争论的。博士毕业后，她是最早进入一个叫做“科学哲学史”的新领域的人之一，并且她成为了同名杂志的一个创始人，首字母是HOPOS。她现在离开了学术哲学界，全心全意撰写各种关于历史和哲学题材的文章。

梁：我发现，您和霍普金斯大学的其他老师都是使用原著来教学。您是否认为阅读第一手资料是研究哲学的最好方法？

阿钦斯坦：是的。我们有伟大思想家的原著，他们在科学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度专业化的时期写作，所以有更多的人能够理解他们。受过教育的人能够看懂他们写的书。而如果受过教育的人能够阅读它们，那么本科生也能够阅读它们。在我开的课程《哲学与科学：两者的一个导论》中，我让学生阅读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科学原著。我们从笛卡尔的方法论（如何做科学研究）开始，接着转向他的物

理学，特别是他的运动定律——研究哲学的人很少会阅读它们。他们认为笛卡尔只是一个哲学家。但是，当然，他也是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他是第一个提出动量守恒定律的人。并且他在牛顿之前提出了惯性定律。所以，我们阅读部分笛卡尔的物理学著作，以及他的科学哲学著作。现在，笛卡尔被称为“理性主义者”。他认为，就像数学一样，理性，而不是实验，是科学中某个命题是否为真的终极仲裁。当本科生读到这一点，他们认为他是疯子。遵循牛顿，笛卡尔最为强大的科学竞争对手，他们认为实验和观察是科学真理的终极仲裁。牛顿说，在科学中我们必须始于他所谓的“现象”——通过实验和观察判定为真的事实。然后你从这些事实出发，继续对你的理论进行因果的和归纳的论证。只有这样你才能判断什么是真的。为了恰当地理解更具现代风格的牛顿主义的科学观点，你需要理解牛顿所反对的观点是什么，特别是笛卡尔的科学哲学。这就是什么在我的课堂中，在讲牛顿的科学研究规则以及他用这些规则去论证重力定律之前，我会先讲笛卡尔。无论如何，笛卡尔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他的写作水平要比现代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高得多。并且，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引出关于科学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令学生感到兴奋。所以，我很高兴从笛卡尔开始讲科学哲学。

梁：我很惊讶那么多学生上您的逻辑课。作为一个推理的工具，您是否认为哲学专业和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都需要掌握逻辑学？

阿钦斯坦：假设你是一个数学专业的学生，并且你对文学课不感兴趣，但是你想上一门能够获得人文科学学分的课程。那么你会上逻辑课，因为它像数学课。就我个人来说，我更愿意看到这样的学生选修莎士比亚的课程，但是他们并不是这样想的。对人文科学中的一些学生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他们看到哲学系开逻辑课，认为这是一个满足自然科学要求的比较容易的方法。这些学生中一部分人的表现并不像他们设想的那样好。但是多数选修逻辑课的人出于恰当的考虑，他们的表现很好。此外，逻辑是有趣的。

梁:就教学方面来讲,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阿钦斯坦:自然科学在教学方面比人文科学更有结构性。学生们先从一些基础课程开始学习,然后按照规定的次序学习其他的课程。这种结构性教学方法在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中并不流行。所以,一般地说,人文科学中的教授可以讲授更多他们想要讲的东西,而不用担心它们是否与某些预先设定的结构和顺序一致。美国的一些大学设有学术课程委员会,教授们必须向委员会提交他们的课程计划并让课程大纲获得批准——表明在该课程中具体将会教什么,以及按照什么次序去教。我们霍普金斯大学并没有这样的学术课程委员会。但是即使没有课程委员会,管理部门依然会鼓励教师预先给学生提供一个详细的课程计划。在我的课程中,我一般会告诉学生:我将会给你们本课程的一份阅读书单,并且说明有几次考试,需要交多少篇论文。但是将会覆盖多少阅读材料,以及什么时候会讲到它们,我会尽量保持开放的态度。哲学因讨论而繁荣。我喜欢在课堂上向我的学生提出问题,并讨论他们给出的答案。这促使他们思考,它是哲学课堂中最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学生并不主动提出任何问题或参加讨论。有时候他们会很主动,这是无法预测的。但是,一旦发生,则通常会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如果你有一个固定的计划,必须按一定的顺序覆盖所有的内容,那么就不会有这种激动人心的时刻。

傅:您说哲学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那么您如何评价学生呢?

阿钦斯坦:根据他们的答案的原创性及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它们辩护。在哲学中,我们需要论证,而不只是论断,并且你能够评价一个论证,即使它不是决定性的。哲学不是数学。它更像是处于其论断没有数学的或经验的证明那些时期的科学。但是仍然可以给出,并且必须要给出,支持一个理论的论证,即使它们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当你为自己的哲学

(或科学)理论辩护时,告诉我它到底要说明的是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做到的。它是否已经具有足够的深度和精确度,所以其他人可以检验它?它是如何解决这个或那个难题的?它的困难是什么?在科学中,你的目标是实验证明,而在哲学中你是无法得到这样的证明的。但是,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哲学中,你都会获得论证,而一些论证会比其他的论证好得多。

梁:本科教育和博士教育有什么区别?

阿钦斯坦: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博士教育更加专业化,即使是在诸如哲学这样的单一领域中也是如此。许多博士生来到这里,说“我想要在这个子领域中研究这个或那个问题。”是的,即使你是博士生也要学习特定的课程,但那是最低限度的。例如,有人来这里但没有上任何科学哲学课。他们不想上,是否是因为他们没有兴趣,或者因为这门课程太难,或者我要求太严,我不知道。但是在过去并不是这样的。当初我刚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时,博士生必须要选修各种不同的课程。你必须学习许多不同哲学领域的课程。现在你不用这样做。当时有四门统考科目,涉及哲学的不同领域,称之为“资格考试”,你必须在博士二年级期末参加考试。对于这些哲学领域,你必须掌握到能够讲授本科基础课程的程度。多年以来,这个考试要求被修订最后终于被取消了。所以,无论这是否是最佳的决策,博士教育已经变得更加狭窄和专业化。

相反,本科教育还是相当宽泛。你不能全选物理课程或全选哲学课程。一般地说,这里的本科生都非常聪明。越来越难考入霍普金斯大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擅长哲学思考。做哲学研究不仅要聪明,还要有一定的奇思妙想和想象力。你必须乐于思考奇怪的问题,并且乐于接受那些你能够辩护或者反驳但不能决定性地证实它们的真或假的答案。你必须超越寻常人的思维。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